

主编 王立胜

中国转型乡村学研究

第一辑

ZHONGGUO
HUANXING
TANGCUNXUE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转型乡村学研究. 第一辑/王立胜主编.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0.10 (2011.5 修订)
ISBN 978-7-5415-4887-1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农村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文集②农村经济-经济发展-中国-文集
IV. ①F3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0240 号

主编/王立胜

本辑执行主编/张晓琼

责任编辑/杨云宝 陈迎芬

封面设计/高 伟

书 名	中国转型乡村学研究 (第一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650034)
网 址	www.yneph.com
印 刷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86 000
版 次	2011 年 5 月
书 号	ISBN 978-7-5415-4887-1
定 价	37.00 元

发刊词

《中国转型乡村学研究》是山东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推出的连续性学术出版物，也是我们倾心打造的学术交流平台。我们将以此促成基于共同学术志趣和理想的乡村研究学术共同体。我们将在此表达自己的观点、陈述自己的学术主张，与学界同仁开展真诚、广泛的交流。“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我们欢迎善意的批评和坦诚的对话。凡有意于农村社会研究的学者皆引以为同道。互通声气，相互砥砺，相互批评，共同提高，一起拓展和深化中国乡村研究。

《中国转型乡村学研究》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出版物，致力于中国乡村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促进中外乡村研究方法的融通和交流，推动中国乡村研究本土化和国际化。《中国转型乡村学研究》以问题为主线，提倡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每辑围绕乡村研究中的一个主题展开讨论和争鸣，凡是论述新思想和新观点的著述，只要言之成理，立论有据，均在参考、采纳、介绍之列，以收“百家齐鸣”之效。

《中国转型乡村学研究》在研究取向、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方面将着力突出以下四个特色，这也恰恰是山东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一直所标榜和倡导的。

1. 中度视角。为了克服既有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方法的某些缺陷，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研究视角，经过系统的理论反思和学术实践探索，我们提出了一个观察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新视角，这一环视前后、兼顾内外、连通上下的研究视阈，我们称之为“中度”，以此为核心概念建立起来的方法论体系被称之为“中度理论”。“中度理论”是我们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提出的一个观察和解释当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分析工具和理论体系，我们希望以此构建一个能够有效推进和深化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并通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形成一种解释力强、应用面广的研究范式，并最终成为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标志性的方法论特征。

2. 立足实践。从变动不居的中国农村社会实践视野观察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问题，沉浸到当代中国农村的现实与经验中去，从活生生的中国社会实践中寻找关乎农村社会现代化全局的元问题，以元问题为中心形成多学科合作

的学术共同体,共同致力于探索 and 解决中国农村研究中的元问题;通过对中国农村经验的具体把握,构建出基于当代中国农村经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层概念。廓清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问题、思考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和方向。同时,在方法论方面摆脱西方学界对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理论阴霾,凸显乡村研究的中国主体性。

3. 面向县域。县域是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问题本质的最佳视角,是中国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应用平台。县域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历史整合的有机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被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空间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从中国现行政治结构与行政体制来看,它又是国家最完备的基层政权,或者说是基层最完备的“国家”。作为国家最完备的基层政权和基层最完备的国家机构,是乡村社会创造性转化的基本单位。通过以县域为对象的中观层次的研究,可以更全面、准确地揭示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找到一条既不同于西方的城市化旧路,也不会回归传统社会形态的创造性转化之路。

4. 问题意识。中国乡村社会问题是一个“问题丛”,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综合性的论题,无论是哪一学科都无力独自对此作出全面准确的解释。因此,中国乡村研究必须强调问题意识,淡化学科意识,以问题引领研究,多学科综合研究,强调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淡化学科边界,实现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的多重范式共生。

《中国转型乡村学研究》期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人的认同和支持,并不吝赐教和惠稿。

目 录

本辑主题: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

发刊词

本辑特稿

在加快转变上做文章,在科学发展上求实效

..... 曾业松 (1)

专家笔谈

“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与中国农村研究方法”笔谈

..... 田克勤 周光辉 曾业松 贺雪峰 周溯源
赵可金 宋福范 段应碧 周向军 季正炬 刘 岳 聂家华 张晓琼 (31)

方法论研究

中国农村研究的“中度理论”论纲

..... 王立胜 聂家华 张晓琼 (51)

关于“田野的灵感” 贺雪峰 (86)

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

“社会基础”视角下的当代农村司法实践研究

..... 王立胜 姚家耕 (94)

社会基础再造: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党史学分析视角

..... 牛玉峰 黄立丰 (110)

“社会基础再造”: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探索

..... 肖 芳 李安增 (117)

全域城镇化:推进农村现代化的创新实践

——以山东省青州市为例 宋福范 (121)

探索争鸣

现代化、农村问题及其政治战略:中国意义

..... 赵可金 (126)

中国乡村合作经济困境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基于文化禀赋的视角 刘靖北 赵泉民 (151)

书 评

治理方式转变与“三农”问题出路

——读王立胜新著《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

..... 何中华 朱忠良 (170)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探索

——兼评《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

..... 王清涛 (175)

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与方法论自觉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研究》评介

..... 聂家华 (189)

征稿启事

在加快转变上做文章，在科学发展上求实效

曾业松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很显然，转变农村发展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解决了十三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镇建设蓬勃发展，亿万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成为产业工人，加快了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特别是近7年来，粮食生产连年增产，农民收入连续增长；农村水、路、气、电、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农村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状况明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变；体制创新不断有新突破，统筹城乡发展进入构筑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阶段，探索出一条从中国国情出发，以共同建设、共同分享为原则，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前提，以农业、农村和农民全面发展为基础，以现代农业发达、基础设施先进、社会事业繁荣、农村环境优美、农民生活幸福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

面对知识经济化浪潮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我国对内对外的开放度不断提高，城乡统筹的力度不断加大，农业、农村发展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不断增多。但是，市场波动、环境恶化等因素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明显加大。一方面，我们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实现粗放型农村经济向集约型农村经济的转变；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农村社会的转型。概括起来，就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换句话说，要在“加快转变”上做文章，在“科学发展”上见成效。既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又要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既要加快农村发展，又要实现农村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围绕上述话题，下面从四个方面谈些粗浅看法，以向大家请教。

一、加快转变农村发展理念，理顺农村科学发展思路

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转变不适应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围绕加快转变农村发展方式，应着重在以下三个问题上转变观念。

第一，把传统重农思想转变为重农业、农村发展，更重农民利益的现代重农思想。

中国历来强调以农为本，存在着重农传统。现在我们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重农程度前所未有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弄明白，今天的重农与历史上的重农，无论内容还是背景都不一样了。同样都重农，新时期重农思想与传统重农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

过去，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历朝历代一方面重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重视农业税收，禁止农民经商。不难看出，历史上重农重税、重农抑商，重的是农业生产，重的是对农民的索取。一句话，重的是农民的力量，而不是农民的利益。因为只重农业生产，重农民力量，而不重农民利益，农业就成了弱质产业，农民就成了弱势群体。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传统的重农思想造成了农民受剥削、受压迫。农民遇到天灾人祸，没有活路，便造反起义。可见，“三农”问

题在历史上早就存在了，而且始终很突出，很尖锐，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依然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同时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目的是从农业、农村拿到更多的积累，加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在这样的发展战略和体制下面，对农民的利益显然也重视不够，由此，国家工业化逐步发展，并形成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却出现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农民对国家工业化做出巨大贡献，但是相当一部分人的温饱却没有解决。

改革开放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并使我国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体制不平等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之间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相反越拉越大。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步伐加快，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党中央决定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依据工业化阶段“两个趋向”的论断，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和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从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出台了7个新的1号文件。纵观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在指导思想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在政策制定上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在战略部署上优先安排农村工作，在资金投入上向农村倾斜，在组织保障上不断加强农村党的建设和领导。所谓重中之重，一是重发展，既重农业、农村、农民全面发展，又重农业、工业协调发展，重城市、农村统筹发展；二是重农民利益，实行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补贴政策，其补贴力度不断加大，补贴范围不断扩大；三是重改革创新，不仅废除了延续2600多年的农业税制度，实行了扶持保护农业的补贴制度，还推进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地管理制度、财政金融制度、县乡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改革。

从中也可以看出，在“重中之重”的思想中，重发展是前提，重改革是途径，重农民利益是核心。“重中之重”思想既重农村改革发展，更重农民利益；

既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也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宗旨。毫无疑问，“重中之重”思想和传统重农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我把党中央新时期提出的“重中之重”思想，叫做“新重农”思想。加快转变农村发展方式，首先必须贯彻“新重农”思想。

第二，把城乡隔离发展的观念转变为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观念。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1956年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指导新农村建设，中央先后起草了两个纲领性文件。一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就怎样建设新农村讲了40条。二是1961年出台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讲了60条。把所有这些政策措施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农业现代化，第二条是农村集体化。

毛泽东就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出许多重要思想，比如“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以及农业“八字宪法”等等。他特别重视农村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主张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到农村去，并全面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现在看来，这些思想和主张都是可圈可点的，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毛泽东极为重视农村集体化，从1956年下半年起，全国推行互助组、合作社，到1958年全面实现人民公社化。实践证明农村合作化方向是对的，但是通过政治或行政手段强制农民入社，土地无偿集体所有，财产“归大堆”，不承认个人产权，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不仅没有促进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相反阻碍了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所以，我们今天还在探索建立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新农村建设，尽管中央做了周密的部署，但由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高，国家财政实力不强，尤其是我们实行了城乡二元体制，有限的财政收入主要投入到工业和城市建设，对新农村

建设投资严重不足，加上集体化走了弯路，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斗争的影响，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无法如期实现，这就决定了建国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只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的初步尝试。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向，改革初期出台的5个1号文件中，依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98年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农村改革发展20年经验的基础上，做出《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10年要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

2005年，也就是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后的第50个年头，中央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并制定2006年1号文件，再次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描绘了新时期新农村建设的美好蓝图，同时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句话、20个字的新要求。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研究新时期农村改革发展的新思路，进一步提出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2010年1号文件强调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关键举措，把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作为第一推动力，把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作为持久动力，把培育新型农民作为根本动力，同时还提出要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制度保障，把加强改进党的领导作为促进农村发展的政治保证。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的内涵更加丰富。

对比一下，不难发现，各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把生产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但是新时期农村发展的内涵不仅包含生产发展，而且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面发展。促进农村发展的方式以及政策措施也明显不同。最重要的变化是，过去站在城乡分割的角度，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村谈农村；如今站在统筹城乡的战略高度，把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共同发展作为前提，强调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在政策措施上，把重点支持工业转向支持农业；把重点支持城市转向支持农村；把重点让城镇居民受惠转向让农民受惠。很

显然，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和城乡发展格局是农村改革以来发生的最本质的变化，也是农村发展方式最根本的转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4年、2005年、2006年的3个1号文件，分别把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作为主题，形成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政策框架。文件提出“两免三补”等政策措施，由过去向农民伸手“要”，转变为给农民“补”，表明我们党的农村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的4个1号文件，除强调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建立长效机制，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特别强调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

7个1号文件不断加大支农政策力度，先后用了“三个强化”“三个高于”“三个增量”“三个增量明显高于上年”“大幅度增长”等引人注目的概念，对“三农”补贴的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不断加大。不断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强调把城市资源向农村输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建立城乡平等关系，全面转换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运行机制。这些新的政策措施，体现了农村发展的新视角、新思维。加快转变农村发展方式，必须继续转变思想观念，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思路新格局。

第三，把粗放型发展的观念转变为集约型发展的观念。

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期，国家把解决温饱当做农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实行以粮为纲的方针，追求粮食产量的增长。农村改革以后，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为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探索了成功的经验，为反哺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各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思路、发展措施等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发达市县，积极探索科学发展的道路，进入了高质量、高效率发展的新境界。总结历史经验和先进典型经验，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必须确立集约型发展观念。

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范，也是农村率先发展和科学发展的样板。村里的带头人吴仁宝早在改革初期就认定发展是第一位的，他抱着“不怕公有私有，就怕两样都没有”的理念，先人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华西村1978年就成为百万元村，1988年成为亿元村。20世纪90年代后，吴仁宝对“发展是硬道理”有着特殊的理解。他坚信“有条件不发展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发展才是真道理”，积极创造条件发展经济，2003年全村营业收入达到百亿元。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推进新农村建设以来，吴仁宝认为“有效益的发展最科学，没有效益的发展最不科学”。华西村以“工业高效益、农业高科技、农民高素质”为目标，做出“山南钱庄、山后粮仓、中间天堂”的新发展规划，2006年销售额超过400亿元，2009年销售额超过500亿元。华西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每年可以支配的集体利润超过30亿元。吴仁宝认定“这发展、那发展，一切为了人发展”，由此他提出要建设人人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美丽的华西村、幸福的华西人”。不难看出，华西村之所以不断发展、优化发展，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断转变发展观念，追求集约型高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华西村所在的江阴市同样是转变发展观念，追求集约发展的表率。江阴市2005年成为江苏省首批全面小康达标县（市）后，认真审视以往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路径，决定以经济发展、财富增加为基础，以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为目标，以个个都有好工作、家家都有好收入、处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为具体内容，提出幸福江阴建设的战略构想。围绕民生需求发展经济，通过经济发展改善民生，让人民分享发展成果，感受幸福生活，激发了人民的热情和智慧，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2009年，完成生产总值1700多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275亿元，分别增长11%和12.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12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3300元，分别增长12%和11%。特别要指出的是，江阴人过去讲发展比增长速度、比生产总值、比财政收入，如今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上、放在社会进步程度

上、放在提升持久发展竞争力上。他们提出用幸福来衡量发展，以民生来考核发展。用 GDP 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用“幸福指数”衡量百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改变了传统的单纯以“GDP 说话”的考核模式，代之以民生为核心的评价指标，并且坚持了人民评价的终极性，体现了人民利益标准的政绩观。当前不少地方仍热衷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江阴市“群众关心什么就考核什么”“幸福不幸福百姓说了算”，把政绩体现在人民满意度上，体现在“人民幸福”目标上，堪称科学发展的典范。

广东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强省。2009 年完成生产总值 39082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 40748 元。珠三角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其主要原因就是不断解放思想，转变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初期，他们采取“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等发展模式，获得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先机。进入新阶段，针对珠三角地区与粤东、粤西、山区之间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状况，采取“双转移”战略，推动珠三角地区成熟产业向粤东、粤西、山区转移，粤东、粤西、山区农村劳动力向珠三角地区转移，激活了全省经济发展的活力，加快了粤东、粤西、山区发展步伐。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他们见事早、行动快、出拳重，采取腾笼换鸟等措施，带动了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广州郊区的增城市，8 年前生产总值达 178 亿元、人均收入达 21835 元，地方财政收入只有 6 亿多元。2009 年生产总值达到 400 亿元，财政总收入超过 100 亿元。今年全市生产总值的目标是 460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7000 美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7000 元以上。他们的发展奇迹没有别的奥秘，就是不断转变发展思路。在宏观上，一方面构建南、中、北三大经济圈，也称“三大主体功能区”，形成“两城（增城市区和新塘城区）三中心（即石滩、中新、派潭三个中心镇）”；另一方面实施全区域公园化战略，规划五年整治“三边”（路边、河边、山边），推进“五变”（家园变公园、田园变公园、果园变公园、校园变公园、工业园变公园），营造国际化的乡村生态大公园。在微观上，引导企业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模式转向效益密集型。力争以最少的成本投

入、最低的能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正是这些新的思路，加快了传统工业改造的步伐，提高了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形成了纺织服装、汽车摩托车及其配件、化工等支柱产业，实现了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五年明显见成效。

归纳上述地区成功发展的经验，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把粗放型经济转化为集约型经济，这是发展观念的转变，也是发展思路、发展战略的转变。

二、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现代农业持续高效发展

农业从本质上说有三个特性：一是自然属性。它和水、土地、阳光等自然环境分不开，是一个天然的生态产业。二是商品属性。农产品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农业应该是市场化、高附加值的产业。三是社会属性。粮食安全和社会发展稳定有重大关联，农业还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产业。

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是世界发展潮流，自然也是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中国传统农业是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等要素的结合，精耕细作生产粮食；而现代农业把技术、资本和管理等生产要素通过市场配置，实现农业优质、高产、高效。工业化社会把工业生产方式引进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实现农业机械化、化学化、产业化和市场化；信息化社会把信息技术和理念引进农业，实现农业设施化、自动化、精准化。现在，我们要走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必须从中国地多，农业文明历史悠久等国情出发，把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理念同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结合起来，把节约土地型农业和资本、技术、劳动密集型农业结合起来，推动粗放型农业向集约型农业转变，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这个转变，必须转动两个轮子：一是农业技术的创新，二是农业体制的改革。最终把简单劳动和土地结合的传统农业，改造成知识和资本为主的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作用优化配置的现代农业。

从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看，粮食生产连续6年增产，农民收入连续6年增长，但是农业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约束增强，加上市场波动，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滞后、成果推广应用体系不全、机制不活，加上农

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提升农业竞争力难度加大；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优势农产品出口严重受阻，加上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从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看，虽然只占 10% 多一点，但关系 13 亿多人口的粮食安全和整个社会的稳定，是典型的“小比重，大问题”。所有这些，不仅要求国家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更要总结借鉴国内外现代农业建设的经验，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现代农业大发展。

针对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应该抓住以下四个重要环节。

第一，加快完善农业扶持保护政策体系。

农业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具有极端重要性，具有突出的社会属性，而长期以来比较效益一直偏低。因此，国家高度重视现代农业，不断采用适当提高粮食价格和增加种粮补贴两个杠杆，加大对农业尤其是对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其重点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综合补贴等措施，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

对种粮农民而言，提高粮食价格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粮食价格始终没能反映出自身的价值。粮食的定价权不在生产者手里，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价格也不完全是市场确定的。这就需要国家发挥价格和市场调控的作用。2009 年以来，国家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每斤小麦增加 0.11 元，每斤稻谷增加 0.13 元。农民们说加价是好事，但增加的太少了。而在国家看来，粮价牵一发而动全身，不适当或不适度的涨价会引发连锁反应，甚至导致通货膨胀。因此，用粮食涨价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空间十分有限。

从世界各国的农业政策和我国的改革发展经验来看，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是增加补贴。近年来，国家改变了向农民伸手要钱要粮的政策，坚持给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保持了粮食连年增产。现在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得到的补贴只有 100 多元，每亩地只有五六十元。由于补贴方式、方法还不健全，一些地方补贴政策还未能落到实处，农民实际得到的补贴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因此有

的农民把农业补贴比喻为一张纸，意思是说补贴太少了，像纸一样太薄了。毫无疑问，我国给农民补贴的数量还不大，比起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补贴水平差距更大，但相信国家随着财力的增强，对农业生产者的补贴水平会有更大的提高，补贴政策也会不断完善。2010年1号文件就明确指出，对农业的补贴要做到“存量不动、增量倾斜”，确保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第二，加快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以来，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经营如何同市场对接，一家一户做不了的事情怎样解决，一直是困扰农业发展的难题。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要使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使统一经营向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这就要求加快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发展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以形成“全程化、综合化、便捷化”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其重点是做好两大文章。

一是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解决“人散、地散”的问题。新型合作组织一般都是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的原则发展起来的，能够引领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比较普遍的方式有种养营销加工一条龙服务的专业合作社、土地入股按股分红的股份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社等等。从领办合作社的主体来看，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由专业大户、经营能手或科技人员领办的，大多按照分工合作、产权明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实行资金、技术、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生产要素的自愿联合。农民提供土地、劳动力和有限的资金，大户提供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形成经营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眼下，农村部分农户进城务工经商，耕种承包地遇到困难，还有部分种田能人和科技创业人员经营的土地太少，难以发展规模化的现代农业，提高土地经营效益。这在客观上要求土地流转起